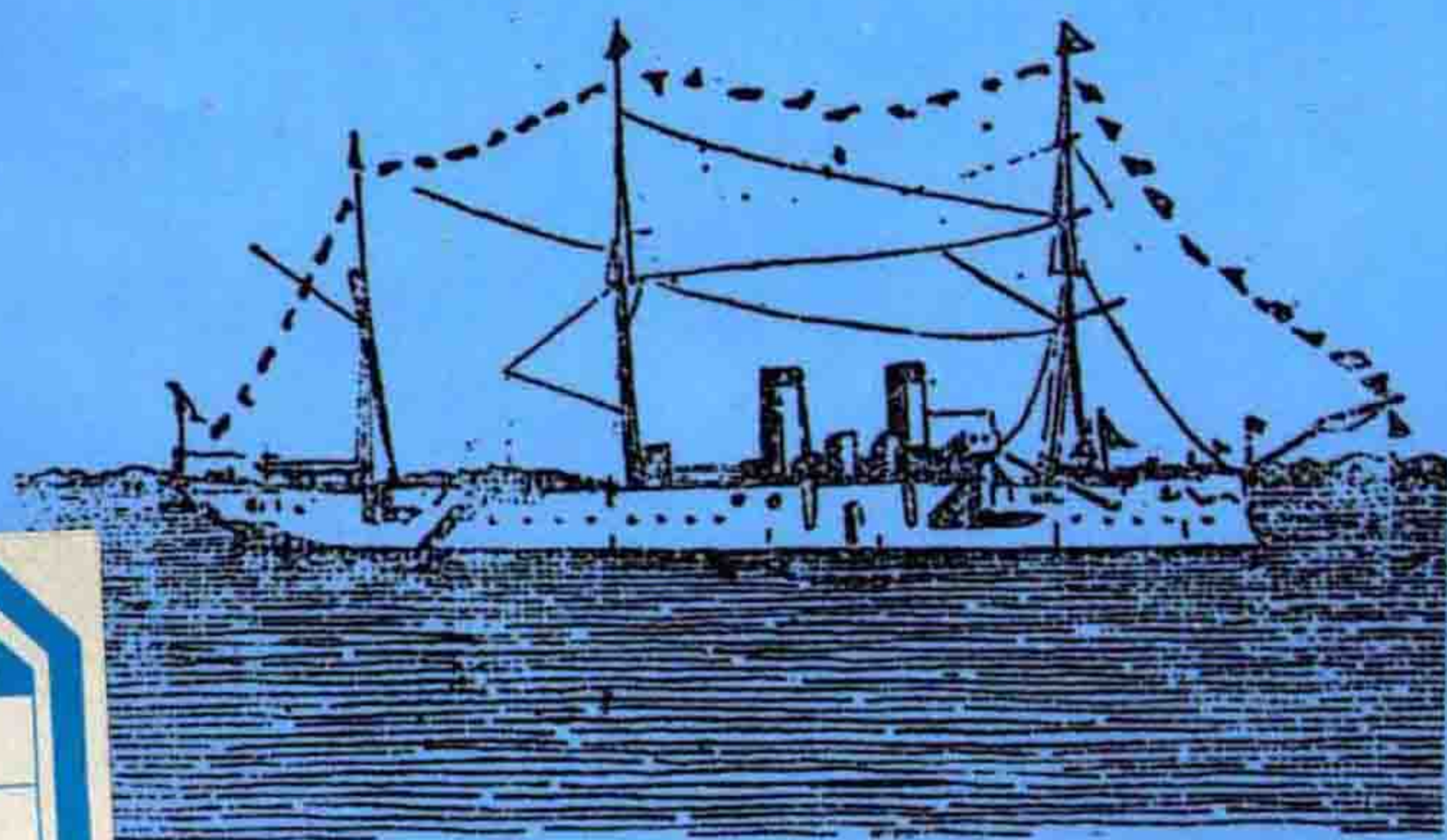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AI GUO ZHU YI JIAO YU CONG SHU

★第十八卷★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第十八卷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本卷目录

洋务运动

一、洋务运动的背景	(3)
二、主持洋务运动的行政机关	(9)
三、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	(11)
四、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	(27)
五、洋务派建立的近代海军	(35)
六、洋务派兴办的教育事业	(40)

魏 源

一、少习经史,以诗文“名满京师”	(51)
二、“入门纷书册,出门耽水石”	(56)
三、入幕贺长龄	(60)
四、“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67)
五、鸦片战争期间	(72)
六、“师夷长技以制夷”	(78)
七、一生治学,十年为官	(88)

左宗棠与保卫新疆

一、少年不得志	(99)
二、神交	(102)
三、身居乡梓,心忧天下	(104)
四、出山	(111)
五、筹饷	(114)
六、官场风云	(115)
七、“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	(119)
八、开船厂,办学堂	(126)

九、剿擒镇回	(132)
十、海防塞防之争	(135)
十一、驱逐外寇 保卫新疆	(140)

省港大罢工

一、南国惊雷	(147)
二、珠江血案	(154)
三、战斗堡垒	(159)
四、工农联合	(164)
五、封锁政策	(167)
六、肃清内奸	(171)
七、审判洋人	(176)
八、火烧东园	(179)
九、谈判斗争	(184)
十、光辉篇章	(190)

香港海员大罢工

一、香港的臭苦力——海员	(195)
二、风雷激荡的世界	(202)
三、香港海员工会	(208)
四、苏兆征与林伟民	(215)
五、“顶硬上，米俾人睇小”	(227)
六、胜利与教训	(234)

洋务运动

徐庆全 编著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晚清统治集团内部有一批当权官僚,感受到外国的“船坚炮利”从而意识到无论挽救民族危亡,还是维持自身统治,都不能再固守陈腐的“祖宗之法”,唯一的办法是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从而形成了以拯救清王朝封建统治、御侮自强为目的,以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为主要内容,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向西方学习的潮流。这次活动,历史上称之为“洋务运动”,而倡导和主持这些活动的官僚,则被称为“洋务派”。

历时 35 年的洋务运动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初,约 10 年,以创办军事工业的“求强”活动为中心,是洋务运动的兴起阶段。第二阶段从 70 年代初到 80 年代中期,约 15 年,除继续创办军事工业外,更大力兴办民用企业,重心转为“丰富”,是洋务运动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约 10 年,新企业的创新不多,旧企业的矛盾暴露,主要成就为北洋海军的建立,是洋务运动的衰微阶段,1895 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以“公车上书”为标志的维新运动发微,洋务派所经营的企业虽继续存在,但洋务运动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一、洋务运动的背景

17、18 世纪,资产阶级在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主要国

家取得了统治，历史进入了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世界的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为了“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从海外殖民事业中获取强有力的动力。在这一过程中，机器工业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无情地冲击着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封建生产关系，资产阶级不但“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而且“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引文为马克思语）。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世界的推进，是以野蛮的杀戮、奴役、压榨和剥削为手段的。从非洲的黑人被贩卖为奴、美洲的印第安人濒临灭绝，到廉价的英国商品把印度手工工人置于死地，一切落后民族成了他们任意宰割的对象。当时，仍然沉睡在封建主义漫漫长夜里的古老的中国，也未能幸免。

1840年，英国带着罪恶的鸦片登上中国海岸后，为了推进在中国的贸易，发动了可耻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在战争中，虽然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国人举起了抵抗外侮的义旗，关天培、葛云飞等爱国壮士血染疆场，三元里人民奋起抵抗，但是，中国落后的大刀、长矛与英国先进的榴弹炮、滑膛枪之间较量的结果，使得满清皇帝不得不将排除这场有可能颠覆自己统治的危险的希望，寄托在琦善、伊里布和耆英之类的议和使者身上。结果，中国人连缔结一项体面的和约的资格也丧失了。

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大炮，不但“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

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世界接触”(马克思语),而且惊醒了一些有识之士。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经过比较、探索,开始隐约地觉察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古老的封建主义面前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割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为了对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侵略,他们从如何取法西方的“长技”而达到“制夷”的目的出发去了解西方。这样的了解,首推 1840 年林则徐主持编译成的《四洲志》和 1842 年魏源写成的《海国图志》。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四洲志》有如下一些记载:英国“惟技艺灵巧,纺织器具俱用火轮、水轮,亦或用马,毋需人力”;法国“精技艺,勤贸易,商船万四千无百三十”。

林则徐显然是以羡慕的心情来看待西方先进技艺的,这种心情在描述俄国彼得大帝学习西方技术的细节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四洲志》写道:俄国“及至比达王,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氏达览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归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对彼得大帝学习西方技艺以致富强的肯定,自然是中国落后却又不思学习的反思。后来,林则徐在被遣戍伊犁途中,对鸦片战争中因“器不良”、“技不熟”而导致失败,仍然耿耿于怀,发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的感叹,并因此总结出取胜的八字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林则徐不但在广州时就“筹计船炮水军

宜”，而且在“获咎之后，犹以船炮二事上陈”。

《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现今被认为是放眼世界的第一人。他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对“夷”可师的“长技”有过论述：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还具体建议在虎门外创建造船厂、火器局，聘用西洋工匠，以期“尽得西洋之长技”，并设想造船厂除造战舰外还可以造轮船，火器厂除造枪炮弹药外还可以制造“借风力、火力、水力”的各种“有益民用”的“西洋器械”。

林则徐和魏源在挫折和屈辱的反思，却在满清权贵的压抑下不能有所作为。林则徐用粤海关税以制造枪炮的建议，被道光皇帝指斥为“一派胡言”；魏源的《海国图志》只是被看作一本新的地理书籍，而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核心思想，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封建统治者对侵略者得陇望蜀的本性没有清醒的认识，依然昏昏然不思振作，依然歌舞升平，醉生梦死。

在鸦片战争后的30多年里，窒息着中华民族生机的历史惰性，又一次遭到了冲击。清政府原以为1842年签定的《南京条约》是“万年和约”，没有想到十几年后侵略者会以“修约”为借口提出种种无理的要求，更没想到他们会再次发动新的侵略战争。1857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1858年，联军攻战天津，逼订《天津条约》；1860年，联军推进到通州，清朝的八旗军“一战而蹶者十之二三，不战而溃者十之六七”，咸丰逃往承德，联军直抵京师，火烧圆明园，逼订《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

接受了本来“断难允行”的种种屈辱条款。与此同时，美国以“门户开放”政策而享受“利益均沾”；沙俄趁火打劫，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中国领土。中国主权的每一项踪迹，在多项条约规定的限度之内，都被一扫而光。

旷古未闻的奇耻大辱，在朝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一部分人开始从存亡的角度认识到除非以武力为后盾，琦善、伊里布和耆英之类老于世故的外交努力是不足恃的。奕訢承认：“夷祸之烈极矣”，“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仇恨”；李鸿章则忧心忡忡地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筹”，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糜集京势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械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冯桂芬则大声疾呼：“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如再不发愤图强，“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因此，冯桂芬作《采西学议》和《制洋器议》，甚至已提出学西方的具体步聚，即所谓“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也纷纷主张“讲求洋器”。

至此，林则徐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才被这30年的遭遇而搞得惊慌失措的权贵们所认可。

但是，洋务派虽然拟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出发点兴办洋务，但把“师夷长技”的行动提到实践的日程，却是为了镇压人民起义而引发的。

当中国遭到列强侵略只能屈辱求和之际，洪秀全在广西举起了反清的旗帜，沿途的贫民和游民立即舍家相从，蜂拥而起，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太平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着顽固的封建腐朽势力，给清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巨大的冲击，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面对着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压力，清政府首先采取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人民并重的策略。但是，当两面出击力量捉襟见肘时，又采取了“两害取轻”的抉择，即先借助侵略者的洋枪洋炮消灭太平天国义军，然后再养精蓄锐以“制夷”。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法、俄两国便向清政府明确表示了“愿为中国助剿发逆”的意向，随后，英国也公开站在清政府的一边。于是，出现了“中外和好”、“华洋会剿”，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太平军的局面。在此过程中，清政府认为，这是“借法自强”的大好时机。1863年，奕訢等奏称：“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外洋如英、法诸国，说者皆知其唯恃‘船坚炮利’以横行海外，而船之何以坚与炮之何以利，遂置焉弗讲。即有留心此事者，因洋人秘此机巧，不肯轻易授人，遂无从窥其门径。……现在江浙尚在用兵，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此诚不可失之机会也。若于贼平之后始筹学制，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此又势所必至者。

一宜趁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即兵法所云‘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者’此也。”在他们看来，“自强”就必须“讲求洋品”，所以必须抓住时机，“不露痕迹”地向洋人求教。以此为契机，在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重臣的倡导下，从 60 年代初开始，出现了一股兴办洋务的热潮。

二、主持洋务运动的行政机关

1861 年，清政府在北京嘉兴寺设立了抚夷局，处理对外交涉事务。后来，这个名称已不合事宜。1860 年 1 月 20 日，清政府根据奕訢、桂良、文祥等所上的“通筹夷务全局析”六条章程中的首条：“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则成”的建议，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应付洋务的中央机关。总理衙门由奕訢、桂良、文祥三人兼领总理衙门大臣，下设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调内阁、军机处和各部院官员、负责日常工作。1883 年，又增设海防股，管理南洋海防和北洋海防，包括长江水师、北洋海军，以及与之有关的各机构和设施。

总理衙门作为一个外交事务部门，不但取代了原由理藩院和礼部掌管的大部分事务，而且包办了一切需同外国发生联系的活动。如，向外国购买军火、船舰、机器；请外国人担任教练、顾问；向外国派遣留学生；管理海关税收，等等。它实际

上成为中央各部的一个综合机构,而且其主持事务之人,往往是具有实权的王公大臣。如,1861—1864年,由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主持,1884—1894年,则由另一位王公庆新王奕劻主持。

在总理衙门成立后,清政府还设置了南洋和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是1866年由五口通商大臣改称,管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南方开放的五个口岸,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的沿江及南方各口岸。通商大臣开始时由江苏巡抚兼领,1865年后由两江总督兼领。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的北方三口,所以又称三口通商大臣。开始时由侍郎衔候补京堂崇厚掌管,1870年起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领。南北两个通商大臣,名为“通商”,实际上“通商”以外的政治性外交等事务也是涉及的。也就是说,既办理有关各口岸的通商事务,也办理其它各项对外事务。

关于总理事务衙门、南洋和北洋大臣在洋务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左宗棠曾总结说:“洋务关键,在南北洋通商大臣,而总理衙门揽其全局。”由此可见,总理事务衙门成了凌驾于六部之上的筹办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而清政府也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自强新政作为既定国策了。所以,研究洋务运动的学者,往往就把总理事务衙门的成立,作为洋务运动开端的标志了。

三、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

由于洋务运动的产生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的，所以在初期时活动中心在于“自强”。关于这一点，奕訢在总理事务衙门成立后几天，即 1861 年 1 月 24 日就明确地说：“窃臣等酌拟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在于练兵。”这就是说，“自强”是围绕着获得外国新式技术、武器装备和练洋操为主要内容来进行的。

奕訢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首先倡导和主持陆军的编练。这里所谓的“练军”，就是使用从外国购买的武器，聘用洋教官对兵士作配合新式武器的训练。“练军”最初在北京的神机营开始，此后陆续推广至湘军、淮军乃至各省兵营的。1864 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政府曾对李鸿章等人在江苏“练军”的效果给以极高的评价：“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于是也。”

在大量购买的同时，总理衙门还极力主张在此基础上开办兵工厂，自己制造。总理衙门刚成立时，曾国藩就提出了建议：“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为永远之利”。奕訢对此意见极为重视，不几天就“筹划办理”。1861 年 8 月，曾国藩又指出，总理衙门奏请购买外洋船炮的要求系“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并且发挥说：“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

在中国则罕于所见。……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奕訢对曾国藩的这番高论极为赞赏，称之为“深思虑远之论”，上折奏请饬令曾国藩“访求一、二诚实洋人，令其指授造法，倘将来中国能于自造，则洋人不得据为独得之奇，而破浪乘风，可以纵横海上，亦自强之一道也。”在奕訢等人的支持下，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了内军械所。

曾国藩相信中国人“智者尽心，劳者尽力，无不能制之器，无不能演之技”，因而，在这个内军械所内，“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而让中国科学家华蘅芳、徐寿来主持。军械所是一个综合性军火工厂，主要生产子弹、火药、炸炮、劈山炮和火轮船。1862年8月，制成了中国第一台实用蒸汽机，它的结构与当时居世界先进水平的“往复式蒸汽机”相类似。曾国藩看了蒸汽机的试验运转后很高兴，当天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也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知矣。”后来，又造成小轮船一艘。当船在安庆江面试航时，曾国藩亲临船头。他得意地说：“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矣。”这个内军械所没有机器设备，仍采用手工生产。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它还不属于近代军事工业，但却为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和近代工业的建立提供了条件。

在安庆内军械所创办一年之后，李鸿章在上海也办起了制造军火的洋炮局。李鸿章是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国家“长技”

的另一个洋务派著名首领。1862年，他率领淮军到达上海，亲眼看到了外国“落地开花”炸弹的威力，赞之为“神技”，决心学习仿造。第二年，他在上海设立了三所洋炮局：一所由英人马格里主持，其余二所分别由丁日昌和韩殿甲主持。丁、韩二局未雇佣外国工匠，也无机器设备，完全采用手工劳动方式，后来这两个局并入了江南制造局。马格里主持的炮局，最初也是采用手工劳动方式，后来虽买到了一部分机器，但“不全之器甚多”。这个炮局一度随李鸿章迁至苏州，1865年又迁往南京，在此基础上扩建为金陵机器局。

1864年湘军攻陷天津，太平天国的失败已成定局。清统治暂时趋于稳定。这年，李鸿章致书总理衙门，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觅制器之器”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所以，奕訢对此很是赞赏。他立即上奏朝廷：“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这个主张得到政府认可后，于是洋务派们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兴办军火工业，近代军事工业迅速兴起，成为洋务运动初始阶段的重心。

据学者们统计，从1865年至1890年，洋务派共创建了21个局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个，即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

1. 江南制造总局